

老子大学主办

新国学月刊



总第 73 期

2024 年 1 月小寒号



《新国学月刊》编委会

总顾问：

雷公 李政 唐仁义
黎鸣 石镓 神圣人
曾向东 华乔 泉头

总编辑：

朱云川 15998980906（重庆）
郭向锋 15193689604（庆阳）
宋心宽 18141905384（北京）
蒋郎兵 13983654902（重庆）

总编室：

共同主义 ABC
关山情 曹公渡 何泳飞
藏闲居 马文杰 熠之
肖月 蓝海浪花 海吟
王鹤云 清风明月 森帅
幸福人 谢国华 淼淼
富雪梅 仇景 彩虹
高正军 今生 吴子
智者说 张国群 何建军
赵华 肖起国 施晓渝

兴国网-老子大学

www.gczyabc.cn

QQ 投稿：241839300

实事求是 学术争鸣
道德自律 文责自负
本期责编：朱云川

【专题】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强大力量- 1 -

黄一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5 -

【陈建国专栏】

关于“中国式民主”的思考

一、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后发优势 13

二、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历史借鉴 14

三、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方法步骤 16

四、中国式民主如何实现现代化 16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路明灯 22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29

【大学之道】

刘忠范：停止行政主导的“戴帽子”运动 35

强调研究生必发论文，误国误民害人匪浅 37

郑永年：中国即将面临一个全民弱智时代 39

几十年文化买办，掏空了我们精气神 43

贵为博士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46

【人民文艺】

丹青风华——开封青年画家丁珂 48

【专题】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21 日至 22 日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聚焦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对照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具体目标，按照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重要要求，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带头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方面的实际，总结成绩，查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中央政治局同志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和建议，撰写发言提纲。会上，先听取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围绕会议主题，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认真查摆、深刻剖析，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气氛严肃活泼，收到预期效果。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聚焦 6 个重点。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坚定。二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坚定。三是践行宗旨、服务人民更加自觉坚定。四是求真务实、狠抓落实更加自觉坚定。五是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更加自觉坚定，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到自身清、自身正、自身硬。六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更加自觉坚定，

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推动经济恢复发展，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粮食总产再创新高，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基本完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抗洪灾、化债险、保交楼成效明显，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港澳工作继续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继续改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发力，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发展。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创造良好成绩。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可圈可点。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认为，一年来的实践再次证明，“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一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有成效，达到了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的目的，对中央政治局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担当使命很有帮助。

习近平指出：

这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主题主线突出，目标任务明确，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在全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首先要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把握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上融会贯通，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要坚持科学决策，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参与党中央研究重大决策时要认真思考，充分发表意见；对工作中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要及时客观全面反映上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在分管领域和主政地方，要注重发扬民主，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要善于正确集中，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提炼出来，作出科学决策。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行为，要及时发现、坚决纠正。

政治敏锐性是政治站位、政治洞察的综合体现，是提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重要前提。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把握战略全局、掌握战略主动、增强各项工作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准确识别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准确把握先机，有效应对风险，谋定而后动。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都要把准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处理解决矛盾和问题时，要注重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领导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反对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反对竭泽而渔、劳民伤财。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

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要靠目标凝心聚力，新征程上我们就要靠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宏伟事业，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善于用党的奋斗目标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来。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持续用力、协同发力、坚决纠治，从领导机关抓起、领导干部改起，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抓、带头改。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为全党树标杆、作表率，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带头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和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来源：新华社 2023-12-22）

黄一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黄一兵 理论中国 2023-12-06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鲜明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保证。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得出的最重要的规律性认识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而且还包含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确立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无论是对一个革命党还是对一个执政党，都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在阶级社会中，“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列宁开启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自觉转化的历程，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坚持文化领导权建设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结合时代条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坚持不懈推进文化建设，有力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提出必须“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毛泽东同志强调：“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

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人民群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在推进文化事业发展中，党中央在政府及其文化部门设立了党组或党委等，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且积极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文化建设事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不断改进和完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从国内看，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从国际看，在百年变局下有效应对外部打压遏制渗透，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机，迫切需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从意识形态领域看，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和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迫切需要有效驾驭新技术和新兴媒体的能力，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更好凝聚共识、争取人心。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党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和形势的发展相比还存在差距，还存在跟不上时代步伐、不适应实践要求的问题，迫切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在及时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实践进步中不断迈上新台阶。

面对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任务是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立场、有原则的，这种立场和原则决定了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成为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能否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予以把握，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2.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之所以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党明确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明确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原则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把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就能站在党的立场上更好、更全面地反映人民愿望，真正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1.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

2.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讲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无论时代如何演变、舆论传播环境如何变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党性原则都不能丢、不能忘，不能有丝毫含糊、偏离和动摇。要增强党的意识，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要求，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讲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有扎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就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同时，应该看到人民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必须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

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之举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1.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新时代的文艺工作，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制定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2.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凝聚起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

3.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注重加强思想引领，始终把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内容，引导、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形成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生动局面。

4.管好用好互联网，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新时代的网络强国建设，始终坚持“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5.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领导，就是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保证党的领导在高校工作中全面发挥作用；思想领导，就是要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科学理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新时代的高校建设，坚持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目标，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

五、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要求是以高度政治自觉、守正创新精神、顽强斗争意志、过硬能力本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面对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面对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和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的复杂局面，面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战略要求和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1.以高度政治自觉担负新使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为杂音噪音干扰，不为错误思想迷惑，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最关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四个自信”、鲜明的人民立场、强烈的责任担当、过硬的能力本领；最重要的是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以守正创新精神担负新使命。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精神姿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趋势，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3.以顽强斗争意志担负新使命。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迈上新征程，面对不同思想文化体系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国家舆论格局更加复杂多变，必须增强斗争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发声、敢于斗争。既要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又要增强善于斗争的能力，把握斗争规律、讲究斗争艺术，研究斗争策略方法。

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推进文化事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通过顽强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的新局面。

4.以过硬能力本领担当新使命。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不断提高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肩负新的文化使命，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引领，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在深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功夫，在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功夫，在促进文化繁荣上下功夫，在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上下功夫，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上下功夫，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不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2023 年第 12 期《党建》杂志）

【陈建国专栏】

关于“中国式民主”的思考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在这个地球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意识也比较薄弱。我们的民主建设相对落后，那么能不能后来居上呢？我认为完全可能，其理由如下：

一、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后发优势

1，西式民主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教训，少走弯路。

西式民主以欧美为代表，但在中国如何搞法？后果如何？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多党制、“民代”和各级负责人选举制，已经将这种“民主”的弊端充分展示在我们面前。以台湾为反面教员，创造中国式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一并实行，如果搞成功了就是“现代化民主”，会比任何旧式民主都更真实，更有效，也更适合中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

2，经过建国七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已经有了“走弯路”的实际体会和深刻思考。至于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正因为全中国人民的意见不统一，可以经过争论，找到共识；对于如何建设中国式民主，进行多方面反复地研究探讨，可以避免结论的片面性。

3，我们的思维方式有明显优势。采用符合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对待全社会民主问题，可以避开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陷阱。

4，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民主理念与执行方式，这一点对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中国几乎是从零做起，很少有旧民主模式的干扰和遗留问题，只需要全力根除封建遗毒就可以了。

二、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历史借鉴

既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建立中国式民主哪里会有什么历史可供借鉴呢？有！不但有，而且很坚实，很先进，很得人心。因为它是跟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的法西斯暴政强烈对比而产生的苏区民主、抗日战争期间的解放区民主。我们要“不忘初心”，怎能忘记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多么的民主！怎能忘记人民军队内部的民主传统呢？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中央苏区艰苦奋斗的时候，在大革命失败后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在随后进行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一直都是依靠党、政、军内部高度的民主制度，来团结革命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革命力量。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井冈山的斗争》）

为方便讨论，可以把革命战争年代的民主制度称为“红色民主”。“红色民主”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在《领导科学》杂志上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1，双首长制

“双首长制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矛盾”（《领导科学》2010•11 月上，15 页），文章被国内上百本书所转载（如《共和国历程》等），说明有不少同行认识其意义。在书上转载时，文章做了修改，即增加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双首长制”一节，并更名为“双首长制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

传统的国家政治领导体制，都是单一首长制。封建社会是皇帝至高无上，宰相只是皇帝的最高奴仆。美国实行总统制，国务卿是他手下大管家。而英国女王只有荣誉地位和象征意义，政治实权操在首相手里。只有中国才真正实行过双首长制，这是我们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可惜在建国后基本上被抛弃了。一些战争年代的电视剧中，还有朱德、毛泽东并排挂像的镜头，显示出双首长制度的历史痕迹。

前苏联的经验证明：所谓“三架马车”领导体制，最终会造成领导班子崩溃。而单一首长制条件下，所谓“民主”是假的。台湾四年一度选举很热闹，一旦谁掌握了政权就开始为自己和所属党派的私利进行政治操弄，台湾人民早就讨厌这

种闹剧了。只有认真实行“双首长制”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为什么“一”和“三”都不行，唯有“双”才行？难道说这是一种数字迷信？否！这里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逻辑。

我国军队实行双首长制是指：总政委是部队的最高政治首长，总司令是部队的最高军事首长，他们各司其职，只有工作上明确的分工，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这种制度从总部直到军、师、旅、团、营、连，只不过营级政委称教导员，连级称指导员。两位首长完全平级，这一点至关重要！两位首长一旦不能平等对待，双首长制就退化为单一首长制。

领导成员之间的平等是反封建的利器。最高的封建理念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旦谁想跟皇帝“平起平坐”，就是犯了谋逆大罪。双首长制直接摧毁了这种理念。

双首长制使领导人遇事跟对方商量成为习惯，因此会杜绝一切独断专行。能彻底消除领导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之与部下商讨问题，向群众和战士们学习，成为职业习惯。使领导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彻底丢掉“官架子”。

2. 定期或者特殊情况下紧急召开的常委会，以及定期或事先商定的全委会。

领导班子不是只有总政委、总司令两位，而是由一个相对固定、并由基层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或军委会组成。如果首长们意见分歧，或者领导层提出要求，往往就要召开常委会或者全委会进行深入讨论，然后依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红军几次在领导班子内部意见产生严重分歧的关键时刻，甚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有时处于少数地位时，都是靠红军中的高度民主机制才转危为安。最著名者如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史界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这不影响我们对“红色民主”的尊重。

3. 士兵委员会对部队领导的全面监督

这要跟党或部队中的专职纪律检查机关结合起来，保证对领导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事先预防和事后检举揭发，让每位领导干部都置身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中，与他自己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相辅相成，使自己工作更努力，作风更廉洁。

以上简单叙述了“红色民主”在三个方面的内涵。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淡化了“红色民主”，结果产生了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悲剧。历史从正

反两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建设“中国式民主”的紧迫任务。

三、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方法步骤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对建国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对毛（刘及周）、华（叶）、邓（赵）、江（朱）、胡（温）及习（李）执政的是是非非，要允许讨论、公开讨论，甚至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开展讨论。如果将此列入“几个不准讲”的规定内容，就完全违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念，即成为反民主的规定。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准老百姓说出自己对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看法，实是奇耻大辱！那有共产党的政治作为，害怕人民群众进行评论的道理呢？应当真诚地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届党中央领导说三道四！

目前，还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民主？因为“现代化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核心”！

第二步，要求各方面提出各不相同的“政改方案”。比如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校，就有权力和义务向中央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国家和地方各级社会科学院，也有这样的义务和权力。搞社会科学研究，就要为政治体制改革出力。

第三步，由党中央正式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对上报的种种改革方案进行审查、比较和反复征求意见，然后归纳提纯出来少数几个（不超过三个）方案，寻找合适单位或地区进行试点。经过反复试点，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党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由中央常委会向党代会提出报告，经党代会讨论通过后，在全国分期分批实行；在实行中再加以完善、提高。对全世界正式公布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具体规定和执行细节，希望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我们实行监督。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中国式民主如何实现现代化

我们为什么提出“现代化”？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再用“老一套”来对待民主问题，我们自己就犯错误了。

比如曾经有过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在 1980

年被取消，今天的互联网和在手机上发送微信，比那时候的“四大”可厉害多了，你根本无法取消！

民主的现代化一定要跟现代生产和生活的高度智能化相适应，不能迷信过去的老一套。问题是我们要真正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并不容易。比如，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认为把群众再发动起来造贪污腐败分子的反，也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新时期的“走资派”就会被扫除干净，社会风气就会变好。奇怪的是：这些怀念“文革”者往往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当成牛鬼蛇神当街批斗过，更没有被关押起来不见天日过。甚至在文革早期，他们还没有出生呢！人的思想是经历和反思的产物，俗话说“不可与夏虫语冰”。信也！

然而，思考过去只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决不是要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更不可能真的回到过去。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

人民就是江山，或者说江山的本质是人民。嘴巴上这样说说，谁都会。问题是某些人一当上领导干部，就会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有的干部制度，本质上仍然是“首长提拔制”。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人民”，对于谁能当那一级干部，丝毫没有发言权。人们的口头禅是“要健康靠走路，要当官得找门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这些顺口溜流传几十年，并没有本质变化。这其实是中国政治悲剧，跟什么“主义”都没有关系。即使是在封建社会，也还有个“科举取仕”的渠道。怎样才能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天大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永远只能是梦想！

首先是观念上的改革，即对“官文化”实行彻底革命。

旧戏里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作为“正面教育”的台词。然而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念仍然是传统的“领导干部要当包青天”的思想脉络，离开干部观念的现代化十分遥远。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的干部观念呢？

我们现在的各项工作，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台电脑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人民群众则是电脑的主体，而各级各部门领

导，就相当于键盘上的操作按键。电脑运作首先要求各组成部件和零件完好无损，安装正确，结构合理；其次要有充足电力供应。在这个前提下，你依程序操作各个按键，才能使电脑运行无误。

一个单位或地区领导，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虽然重要，却非常明显，很容易被看到。而他所管辖范围的广大干部群众所做的工作，却很难被领导或外界发现。但是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导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发现英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所谓“电力供应”，相当于你手下群众最起码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需求，你不但要掌握，而且要充分给予保障。一旦那个地方“停电”，整个电脑就彻底不能运转！

其次，对“红色民主”要加强研究。

它在过去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那么巨大的贡献，为什么以后竟被放弃了呢？

这说明它很优秀，却未能与时俱进，不适应建国以后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作为全党全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此负有一定责任，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他老人家。在革命者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他能够提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整套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世界上那有百分之百顺利的事情？

比如说，在战争年代，总司令和总政委“平起平坐”很好理解，也很正常，因为战争年代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明摆着的。战争结束了，以和平建设为中心，作为“国家总政委”的毛主席，去跟谁搞“双首长制”呢？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怎么着也不好办哪！而一旦“双首长制”不存在了，“红色民主”的其它方面虽然形式上还存在，也很难发挥战争年代那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红色民主”加强研究，就是要找出让它适应新时代的办法来，实现中国式民主的与时俱进。

现在的常委会议，常常限于“内部讨论”。如果一个重大决策出了问题，或者取得成功，人们无法知道在讨论和通过中央重大决策时，每位常委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赞成？是有自己的主见还是随大流？历史事实教育我们：这种在政治上“吃大锅饭”的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党员，甚至中层干部，都对领

导干部“有没有真本事？”无法做出判断。一个干部在政治上是否无能？他或她对于重大是非问题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我发表“‘常委表态公开化’机制探析”（《领导科学》2010•5 月上）一文。就是希望今后中央和各级常委在讨论重大问题时的态度，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公开。这比官员财产公开重要得多。因为官员财产来源极其复杂多样，财产多寡并不直接说明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在深入一步的调查中，又会发现许多意外情况。然而官员们的政治作为，却能直接说明他（她）的品质优劣和政策水平高低。我们知道，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后后患无穷，上游支流水灾频频，是因为有“水墙”拦在了支流注入主流处，使得支流河水中含有的大量泥沙，在支流注入主流之处不断淤积，形成“拦门砂”。最终导致洪水泄流不畅，水灾不断。这种违反水文学基本常识的做法是怎么形成决策的呢？至今无人为其承担责任！

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对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是目前还保留的一点民主形式。但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变了味儿——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实际上成了对一些“名人”或代表性人物的一种政治安置，更多的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当然，我们对一些代表或委员，在会议上敢于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和建议，还是要报以热烈掌声！这说明中国的“红色民主”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做得太不够了。

第三，破除“外行领导内行”的魔咒。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所谓“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问题。不错，这话确实是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但我们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却大有讲究之必要。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必然犯教条主义错误。

从原则上讲，这个话并没有错。例如，刘备文不如诸葛孔明，武不如关、张、赵，但刘备却是这四位顶尖人物的领导。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领导学本身是一门独立科学，甚或是一门艺术。不懂领导学的基本道理，你的专项本领再强，也当不好领导。因为任何能人都是术有专攻，真正的全面之才极其罕见；而且你的本领如果真的太全面了，就很难再做到精准和专业，因为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有限。

其二，如何让被领导者服你？凡是让手下佩服的领导人，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以力服人。比如古代强将手下兵卒，就是见到将军武艺高强，能打败对方将领，才认为跟着他干决不会吃亏，愿意服从他领导。

另一种是以智服人。领导者太聪明了，别人玩什么花样都骗不了他。这也会让自己的手下佩服，心甘情愿跟自己走。

第三种是以德服人。他的专业能力未必比你强，也并不显得聪明过人，但他的道德品质高尚，让你佩服。

领导工作的事实是：以德服人者，人恒服之；以力服人者，人被迫服之；以智服人者，人惧而服之。品德高尚，并不等于专业知识强，不等于内行；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

为什么要避免对此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呢？如果一个专业技术人才，自觉地让优秀品德主导自己的专业工作，那他自己就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典范。例如一些爱国科学家在敌对国家“无所作为”，而回到国内就“大显身手”。对于这样优秀的爱国人才，你还怎样去苛求他？他做好了本职工作，就是政治思想过硬！

外行领导内行，就是让科学技术工作服从完全外行的人领导？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和阻碍作用！把正在耕种的良田荒废掉，在那里建设高速公路和漂亮住宅、商店、宾馆，说要发展旅游业；然后再到荒漠地带去打井修水渠，要把沙漠变良田。这种荒谬的决策有什么科学根据？完全是为着形式主义——上报生态建设成绩数据的需要。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采取教条主义立场者，是你们自己在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誉！

我出身地质工作者，对于错误理解“外行领导内行”带来的恶果有实际体会。某地花几年时间上数百人的队伍，寻找所谓“红土型金矿”；结果浪费国家投资数千万，一无所获。就是某地质局的外行领导，不听我这个地位卑微内行的劝阻，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

第四，民主制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以上所述，是破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某些障碍。真正要实现现代化民主制度，必须从民主制度的科学化做起。放弃现代科学，民主就不可能进步。

对于传统教科书上的政治概念，必须有全新的真正科学的认识。我不是说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要全部推翻，而是说对一些基本内容的理解必须现代化和科学化。

传统政治观念停留在“政权政治”层面。而你掌权之后，执行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这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根本。也就是说，由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政治已经上升到“发展观政治”层面：你掌权后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思路？这就是最高的政治问题！有些地方把这叫做“民生政治”，是比单纯抓政权进步了，但还不够。

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政治已经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关键在于：单一注意自然生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密切注意社会生态的发展和变化，让社会生态向着科学化、和谐化发展和变化，这就是新时代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社会生态科学化和现代化，是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决不可小看了这一要求。

其一，系统论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的现代形式，生态政治就是用系统理论来对待政治工作。所谓“系统地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是新时代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办法，早就不是政治工作应该采取的方针了。

其二，要重视数字技术和智能科学发展，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何对待在网络上和微信里传播的政治谣言？或者极其片面的事实讲述？建议中宣部设立专门的辟谣网站，定期不间断地辟谣。这需要花费一些专家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于提高全国人民对政治是非的辨别能力很有好处。简单撤掉不良信息，不能教会人如何辨别真假，反而引起怀疑。

其三，重点是改变干部的“首长提拔制”。

怎样把干部的选择和鉴定权力，真正地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件事存在的逻辑矛盾是：我是一方首长，挑选和使用干部应该是我的权力，都交给你们了，我使用干部不能得心应手，怎么办？对于这样的首长，就要向他大喝一声：你这样想完全错误！连你自己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怎能对助手和手下挑三检四？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就要善于团结不同组合的班子成员，因为革命队伍的组成本身就复杂多样。班子成员的多样性组合，反而有利于领导成员开展工作。

领导干部选择的困难在于：广大选民对候选人并不了解。国外选举搞竞选演

说其实有一定道理，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但演说内容和方式一定要适合中国现实。比如，对于不习惯口头表述者可以改用文字，但必须是自己写作，不许别人代劳。文字竞选的好处是：立此为凭，将来对干部考核有据可查。演说方式也可录音，但容易被删。

废除首长提拔制，希望从党中央做起。中央各领导人，甚至领导班子的组成方式，都至少要在“全代会”一级范围内，获得多数通过。然后由上级派员监督，实现各层级领导班子配置的“废除首长提拔制”。这个工作做好了，领导干部就真正成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才能提高，才会开始关心“我们归谁领导？”这个重大问题。

干部实现“民选”，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开始。以后的工作，要在实践中边做边讨论，逐步提高。比如“选举法”的修改、补充、完善，只有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再行。

作者电话：13177830392，电子邮箱：chen19400916@126.com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路明灯

陈建国（江西社科退休院研究员）

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于两百多年前的德国。他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光辉，不仅照耀着今天的中国，还必将照耀未来的世界。

—

早在 1873 年，他就想写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但是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的去世，使他忙于“更为迫切的义务”，所以只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这样的 30 余万字（中文）的

详细写作提纲。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在大学学习地质课程的时候，读到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这本书。里面最触动我灵魂的，也就是人们最常引用的一段话是：

“简单地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

界。……”

“可是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接着，他举了大量欧洲、亚洲的事例，说明历史辩证法的残酷无情。人们被自己的盲目、自私和对自然的无情所伤害。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直到现在所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求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有用的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而且是由于逐渐的重复积累才发生的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一直是完全被忽视的。”（(1)145-147 页）

我的理解是：人类的盲目性和短视行为，造成了这种从喜剧出发带来的悲剧后果。

二

在恩格斯的论述提出近六十年以后，奥地利人 V·贝塔朗菲在 1937 年创立了系统论。到 1948 年他在美国再次讲授“一般系统论”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

不断努力，如申农的信息论（1948）、维纳的控制论（1948）、托姆的突变论（60 年代末）、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1969）、哈肯的协同学（1977），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理论学说。

系统论的著名论断是：万物皆系统。既然如此，人类就是个大系统，它由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构成，而人类系统本身又是地球大系统的子系统。恩格斯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角度，讨论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的错误方面，违背系统论原则，带来可怕的后果；这说明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人必须把自己看成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子系统），而不是高踞于大自然之上的主人。人类无权支配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不是人类的奴仆。

所以我说：系统论从全新的角度，深化并且具体化了，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认识。

三

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37 页）为了杀死害虫和追求农作物的高产，人们发明了农药和化肥。但是农药对于天然生物的巨大伤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 1962 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描写本该生机盎然的春天，却一片死寂。作

为学者与作家，她饱受农场主和杀虫剂生产商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卡森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正是在反对者的攻击声中，她的关于保护环境的呼吁，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全面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作者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卡逊遭受到空前的诋毁和攻击，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深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又一可贵成果。

四

恩格斯教导我们：“没有理论的思惟，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就会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唯一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思惟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思惟的最确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思惟的道路。”（(1)37 页）

“错误的思惟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1)38 页）

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根本起作用的理论，它教导我们要正确认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如果为了强调“政治正确”而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我们就没有资格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把他自己和战友的智慧，以及他们共同努力创造的精神成果，用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出来。然而曾几何时，我们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不仅在人群中寻找和制造“阶级敌人”；而且“战天斗地夺高产”，与自然界的“斗争”也走上歧途，例如“围湖造田”、在没有处理好上游泥沙的情况下，就在主要河流中段拦河筑坝蓄水发电，导致上游支流洪灾不断等等。强调“人定胜天”，不尊重自然规律，实际上违背了由恩格斯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某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人定顺天”！

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我们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仍然是实践了恩格斯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不重视“摸”之前的理论预测，就一定会走上恩格斯所批评的“轻视理论”的错误道路。在转变过程中，我们的确充满盲目性，也犯了不少错误。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主张有错必纠，知错必改。大搞阶级斗争不仅不会有和谐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解决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才真正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严肃说明：不科学的发展后患无穷，这正是恩格斯再三强调的观点。“五位一体”的提法，是将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进一步中国化。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把人类看成一个系统，和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在恩格斯思想指导下，纠正和解决更多的思想认识问题。例如，如何用全新观点看待新时期的阶级关系，等等。

五

根据前面的分析，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承继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那么自然辩证法理论本身有没有理论渊源呢？答案是有的。因为人类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任何重大的思想成果，都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没有例外。

在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但黑格尔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蔑视，不代表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态度。因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进军。多数欧洲学者承认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了大量欧美科学家和学者们的资料，却很少涉及中国学者。这既是他的不足，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这反映的是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落后的社会地位，决不代表学者们不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马可·波罗在西方有很高知名度，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述了公元 1271 年至 1295 年他从欧洲到亚洲的旅行见闻。特别是他在中国元朝的传奇经历，除了展示东方经济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更引起了航海家来中国探索的兴趣。当然，他在记述中所用的惊奇口气和描写的神秘色彩，甚至引起人们的质疑。比如他说，中国人不烧木柴，而烧一种黑色的石头（煤），火力比木柴大得多。对待质疑，他说：我向上帝起誓，我所说的还不及我所看到的几分之一。以后的探险家，如著名的哥伦布等，就是受到这份游记的鼓舞才出来冒险的。一些更晚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尊重，甚至胜于我们自己。例如，作为量子力学

奠基人之一的尼尔斯·玻尔，将中国古代文明总结为“整体论”和“互补论”，他所一再强调的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即源自他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2006 年夏天，我在圣彼得堡参加国际会议时，会议主席斯维尔得罗夫先生对于中国道家学说的推崇，更令我感动。所以我以为，自然辩证法思想最古老的根源，来自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

六

我们把自然辩证法思想体系的源头，归于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决不是贬低恩格斯。恰恰相反，指出二者的精神联系，只会增加我们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亲切感。这正如我们把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归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决不是贬低它们一样，因为人类的先进思想总是一脉相承。

混淆道家 and 道教的人，以为推崇道家学说是推崇宗教。以为“天人合一”，就是讲“人的命天注定”；“无为而治”，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这样就把道家学说说成是消极处世，不求进取的歪理邪说。这完全是误解。其实“天人合一”就是讲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要在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劳作。不可逆天行事，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自从党中央提出弘扬传统文化以来，我们更多地推崇了儒家学说，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说明了这一点。对道家不够重视，是明显的缺陷，建议有关部门努力改正之。如果我们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有深刻认识，有崇高的敬意，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儒家主张矛盾和谐论是对的；但它侧重维护封建秩序，反对社会革命，存在很大片面性。

七

我们接受自然辩证法理论，承认恩格斯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应该改变传统的政治观念。

传统的政治观念，是把夺取和保卫政权叫做政治，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它处于政治的第一层级，“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政治观念的产物。在革命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这种政治观念完全正确。但在革命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这种政治观念就落后了，因为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先生提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现代政治观念，已经超越了政权政治，上升致第二层级。这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看成是与经济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高度一致。两个层级的一致

性在于：如果我不掌权，我凭什么管理这个社会？所以说，传统政治观念并不是错误的，而是过于低端。

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相似。社会是大企业，企业是小社会。政治正确，就是管理得好；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是管理成功的标志。国际社会将系统论用于企业管理，取得不少成就。钱学森同志在中国大力倡导系统论、系统工程，本质上是想用系统论管理整个社会。然而，系统论在中国热闹有余，落实不足，原因在于没有采纳孙先生的政治观。其实把管理看成政治很直截了当，我们的政治部门由组织和宣传部门构成，它们就是协助领导搞好管理工作。政治范畴远大于阶级斗争，例如阶级合作、政党联盟、组织和动员民众等等都属于政治。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而不等于政治。把阶级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是共性（政治）与个性（阶级斗争）的概念混淆。分析说明：孙中山先生对于政治所下定义才是正确的。

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观念，强调生态建设的指导地位，使我们的政治观念上升到第三个层级：生态政治。社会管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终极目标，不仅仅停留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就是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落到实处。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政治正确。改变政治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就有了全新的内容。

八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体系，更有着在全世界逐渐落实的长远意义。

当一个政权被资本控制的时候，社会管理的一切目的都是追求资本的最大增殖。这在 2020 年春天的全球新冠病毒泛滥成灾的情况下，看得更加清楚。这就是“资本政治”，它完全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即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问题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阶级斗争模式转变为生态文明模式以后，才会渴望学习和落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 2007 年党的十七大，经历了 58 年，我们才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在此之前，我们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不具备提出此项目标的条件。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从 2013 年“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多次到各省、自治区代表团与代表们座谈，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意义，宣传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

展现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认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018 年 5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这说明党中央已经确认：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但是，党中央把生态作为政治的政策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地方上和各部门的“GDP 挂帅”，甚至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观念，时时会冒出来作梗。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这就是说：犯生态错误，就是犯政治错误，不能容忍。

2018 年 5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说：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原由。

中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个党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对于生态问题就是今天的政治问题的落实，还有如此多的困难和不足。可想而知，要让生态政治观念冲破资本政治的阻力，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该有多么的困难和曲折！

但是，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生态政治的观念走向全球，争取成为全球共识。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早在 2013 年，习近平就说：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

一些学者指出：工业文明之后还应该是智能文明。智能文明的发展将提高人类的预测水平和全球协调能力。这有利于贯彻落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促进生态文明全球化。

2013 年 7 月 18 日，习近平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的贺信中说：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2018 年 5 月，他说：

“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许多次讲话，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我们并没有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很快就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恰恰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困难的严重性，知道资本政治的顽固反扑，和不断捣乱。我们实际上做好了迎接艰苦战斗的准备。在全党、全国掀起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热潮，真正弄懂由恩格斯本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纠正一切违背自然辩证法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这样，就是用实际行动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我们曾经为社会主义设立了几条标准，但前中共某总书记却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位总书记说了真话吗？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认真冷静地分析一下，这种情况还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本来就不准确，更不严密，值得推敲。

一、现有定义与事实的差距明显

百度上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资料主要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这里强调两条：一是公有制，二是分配原则。苏联解体以前，毛泽东同志已经给它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但那个时候的苏联依然实行公有制，说

明公有制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本质不变。现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少部分国有企业，说明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这里的要害是公有制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生产主要是为了资本增值，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公有制企业，实际为少数官僚据为己有，公有制外壳虽在，本质已经变化。

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实的分配制度相当复杂。以中国为例，按劳分配离开实际要求距离甚远，地区差别、行业差别、部门差别都远远超过了劳动本身的差别。干部收入与职务挂钩，但是职务高低并不等同于劳动的质量高低。相同级别的干部，在革命老区的收入只有发达地区的一半儿，甚至更少。再者，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管理模式，分配制度是被决定因素，不是主导因素。

列宁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对此，当然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列宁实际的意见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但这并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都是打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出了叛徒的结果，而是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有内在的根本性缺陷。出一个叛徒就能把整个制度推翻，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是纸糊的。说出一个叛徒就会“变天”，是认为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现实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勾结贪官、欺压百姓的少量“坏资本家”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如华为老板任正非一类的“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家”。换句话说，“私企姓社”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这就直接推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及企业）性质的说法。

还有些说法，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有一定关联，但同样不能确定一个国家“姓资还是姓社”？例如党的领导，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叫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民主讨论”的形式，宣布解散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事实是：国家是不是由党来领导不能决定社会性质，而执政党是否变质，即执政党的性质，反倒可以决定社会的性质。但这样说，等于说执政党的性质和它所领导的社会性质相同。

还有些说法，更不能直接把握或确定社会性质。例如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真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吗？有人说是官商代表：主要成员都是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但基本上反映事实。说不全面，

是因为精英就是人民中的杰出人物，不能说他们完全不代表人民。但身处基层的广大普通百姓有什么困难和苦衷，他们都知道吗？多数人未必知道！

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妥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大清洗”，我国在文革时期的“清理阶级队伍”，都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对待，制造出被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灾难，大量伤人且伤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和信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专政在任何社会都只是手段。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就是把手段当目的，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目标。

总而言之，现有的定义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都只是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侧面。

二、生产目的讨论的重大意义

与 1978 年 5 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相似，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还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 1979 年 9 月 30 日《理论动态》第 160 期发表《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开始，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此文。胡耀邦亲自点名并指导吴振坤撰写有关文章，文章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对于过去一些左的口号进行了批评。例如，“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就是针对农村一些左的做法，进行拨乱反正。在此期间，吴振坤撰写了约 25 篇文章，其中“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甚至批评了“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等革命口号。胡耀邦同志对一篇介绍斯大林同志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意见的文章作了不少批语，并称“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的同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文章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他所提到的两位同志，就是蒋映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和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见当时的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生产目的的讨论。（以上引自网络）

胡耀邦同志已经作古。我们在感受他的民主作风和亲民情怀的同时，对他关注生产目的的讨论，表示衷心的敬意。因为只有生产目的，才能真正决定企业和国家的性质。我们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生产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从汉语的词义讲，什么叫主义？主义就是行动目标，就是干一切事情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所以可以认为：决策目标是判断企业或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凡决策目标是为着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就都是社会主义；相反，凡是决策目标是为着资本增殖的，都是资本主义。采用决策目标来检查、判断企业和国家性质，是简捷、精练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其它方法仅仅具有补充和辅助的意义。人们承认北欧国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就是因为它们比较地重视人民福利事业，照顾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把资本增殖看成唯一目标。

这就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生产目的讨论，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修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在认识实际问题上，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

过去，我们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思想上总是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搞！例如市场经济，有些人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计划经济。

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这很好理解：生产不能消费的东西叫浪费。我国从 1954 年干部工资制度改革以后，取消了供给制，消费就已经完全市场化了。统一发放服装、日用品的时代成为过去。而消费的市场化必然要求生产的市场化与之相适应。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多少？生产者并不知道，只有市场知道。所以，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决不是向西方学习，更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无关。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与生产原则相互矛盾：按劳分配却要求按需生产。我的劳动产品并不是我所需要的，是不是社会需要的我根本不知道。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市场调节作为工具。其三。现实世界是市场化的，我国发展经济要投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也市场化。否则，无法与世界接轨。

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理由十分充分。所以，搞市场化改革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说明了金融业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企业，或者一个

国家，把“赚钱”作为奋斗目标，或者很看重 GDP 的数据，都没有错。问题是千万别把手段当目的：金融业，或者 GDP 的增长，二者都是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的。后者才是我们真正的奋斗目标。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是因为它们把“资本”当成了“主义”，牺牲一切，都只为了资本增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人们生活水平差距巨大，使已有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化；以致量变引起质变，爆发武装革命。社会矛盾长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这个社会还能使人民幸福，社会发展进步吗？当然不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

采用决策目标来划分“两个主义”，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两个主义的确是对立的；但还有另外一方面：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资金是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社会事业的基础条件之一。钱多了并不是坏事，钱多了用错了地方才是坏事。一个企业缺乏社会进步目标，只把赚钱作为目的，它只要合法经营，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但它拿钱干坏事，如贿赂官员，欺压百姓，涉黑贩毒，违法乱纪，那就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一个民营企业，也可以有远大的社会发展目标：如有的民营企业老板，集资治理沙漠；有的关爱老年人健康，致力于改革推进养老事业；有的关爱青少年学习，捐资办学；有的致力扶贫济困；如此等等。这样一些关爱社会、关爱民生，有远大社会治理目标的企业家，有理由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赚钱和搞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这让我们对两个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决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社会主义领导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让资本主义领导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可能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企业的性质同样可以这样判断。

这件事的国际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对于国际资本主义集团进行的斗争，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决不要幻想在一个早上消灭资本主义。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认识到两种主义的对立尽管很严重，却并不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也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汲取社会主义国家某些长处，一些新的做法，在不动摇资本统治的前提下，对于社会进行一些改良。这种改良的结果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延长了资本的统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很大。“两参一改三结合”，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得很好，但它们只要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他们公开地引进鞍钢的一些具体做法，丝毫不怕被“赤化”，说明给一些事物简单地从政治上贴标签是不科学的。

从最终意义上讲，资本统治世界，连资本家也成为资本的奴隶，是反人类的，是物统治人的治理模式。所以，资本主义的统治必须被推翻。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革命家应当怀着解放全人类的态度，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做好这件事。甚至也要把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怀抱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就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民和更多的国家，共同建设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学之道】

刘忠范：停止行政主导的“戴帽子”运动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教授刘忠范

《中国科学报》记者 田瑞颖

“忙”，已经成为很多科研人员的常态，他们忙着很多事，唯独很难静下心来忙学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将很多被迫忙碌的科研人员，比作沤麻过程中被呛出水面的鱼，“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折腾而已”。

“小时候，我经常看见农民沤麻。他们把麻捆扎起来泡在池塘里，一段时间后再捞出来剥下皮。浸泡过程中水会变臭，池塘里的鱼显得特别活跃，拼命地游来游去，甚至徒手就能抓到，其实这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假象。”刘忠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这种“沤麻现象”很像当下的科技界。“科研人员疲于奔命，满世界开会、跑经费、炮制论文、申请奖励、抢‘帽子’，还有没完没了的汇报材料和汇报会议，很像那些沤麻池塘里的鱼，一派‘繁荣景象’。”

“要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破五唯”行动已有 5 年，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少科研人员“吐槽”自己比以往更忙。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

随着更多的政策出台，很多高校等单位相继建立新的人才评价体系，但也出现了量化指标越来越多等违背“破五唯”初衷的现象。

对于“破”之后“立”什么，刘忠范建议要重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以统计数据为出发点的‘数字化’评价机制是科技界一切乱象的根源，而统计数据永远不能评选出真正的人才，也无法反映出一所大学真正的实力。”刘忠范说。

在他看来，“数字化”竞争带来了大学争相扩大规模、研究团队规模无限度膨胀、科研人员拼命发表论文等诸多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现象。

“‘数字化’评价的根源是过度的行政化管理。”刘忠范直言。

他指出，过度的行政化管理导致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能力越来越弱，难以真正发挥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监督作用。在现实中，教授的声音极其微弱，“教授治校”也仅仅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主导着大学活动的方方面面。

“要尽快停止行政主导的‘戴帽子’运动”

在刘忠范看来，数字化评价机制的孪生兄弟就是“帽子满天飞”，“这些‘帽子’带来了浮躁和功利化，对我国科技发展之弊远远大于利”。

在纳米科技领域深耕 30 多年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拥有很多重量级“帽子”，但他毫不避讳对“帽子满天飞”现象的批评。

“我们对人才的重视习惯于给你戴‘帽子’。”对于从国家级头衔到地域性头衔，刘忠范开玩笑称，这些多达数百个的“帽子”名称，几乎用光了中国的“山川河流”。

“科研人员终其一生在追‘帽子’和爬梯子，因为‘帽子’意味着地位，更意味着物质利益，这严重背离了科学精神。”刘忠范说。

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协会副会长李志民也曾指出，“破五唯”在部分单位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一边强调去“帽子”，一边又在发“帽子”。不在源头上加以扼制，仅靠约束高校、科研单位，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去“帽子”的目的。

对于过去 30 年来，激励人才的初心和取得的成绩，刘忠范表示高度肯定。但他也指出，人才政策要顺应时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应坚决摒弃‘数字化’评价机制和‘运动式’人才激励模式，让学术界归于安静，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所必需，也是创新型文化土壤之特征”。

对此，刘忠范呼吁，要尽快停止行政主导的“戴帽子”运动，禁止启动任何新的‘帽子’工程，逐渐减少‘帽子’数量，最终消除‘帽子’，让学术界回归“安静”，让人才回归“学术”。（科学网 2023-12-19）

强调研究生必发论文，误国误民害人匪浅

——南开副校长陈洪

2023-11-12 · 近现代史论

杨阿敏：这么多年来，您也指导了不少硕博研究生，在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心得和方法？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首先说说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本身的问题。第一，咱们规定的学制太短。在国外，想拿一个文科的博士，没有说三年就行的。除非你是个超级天才。不是都可以延长吗？问题是国家不拨款，延长了连住宿都没法保证。而且一延长，超出标准学制，将来找工作又是问题。实际上，应该把研究生的课程作为论文写作的资格，和论文的写作适当的分离，可能会比较好。课程全通过了，有了资格了，你自己去写，两年写出来也行，五年写出来也可以，在这期间你去工作也可以。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既可以保证质量，又减轻国家负担。

第二，就是强调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要发表论文。这个事误国误民，害人匪浅。这事是从哪来的？在 90 年代，开始注重学校和学科排名的时候，南方某大学先玩了这么一手，强调自己的学生必须要在刊物上发两篇文章。干嘛呢？一统计学校的论文数，它就排到前面去了。别的学校也不傻，你会玩，我也会玩，这就开始蔓延开了。当时，南开抵制最厉害的是我和历史系主任朱凤瀚，朱现在在北大，原来曾到国家博物馆做馆长。每次开有关的会，就我们俩坚决抵制这件事。我们举好多例子，指出学制本来就短，学生需要大量读书、思考、讨论。急着发东西，过去认为是当学生的大忌，太急功近利了！其实教育法、学位法，哪儿有这一条啊。

蔓延开了之后，想一想全国一共才有多少刊物，每一个学生就要发两篇以上，再加上教师、研究人员的量化考核，怎么能发的过来——且不论发出来有多大意义！可是不发的话，这人生就有问题了，饭碗就没了，这不是逼良为娼吗？你上网看看，有多少干这行的：你这交给我多少钱，我保证给你发一个什么论文。然后，刊物本身也腐败了，寻租啊。这种大量的论文制造、堆积，也造成学术的泡沫和腐败。过去那些老教授，多数一辈子可能就是三两篇文章，一辈子可能只有

一本书，也可能还没有一本书。但是他教课很认真，他述而不作，把文化认真传递下来。我觉得比堆积数量好得多。

现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是受国外影响。其实，国外的学校和学科排名当初怎么来的？那是美国一个刊物办不下去，弄这个试试，一弄就成了风气。成了风气最大的问题在哪？一个就是重量化，轻质量；然后成为一种价值的导向，轻教学，轻人的培养。对人文学科戕害最深。把教师所有的工作全都跟生产队记工分一样，给你整个的精神世界扭曲得不得了。又加上社会上不良学术风气，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发过几篇东西，成为了大学教师、学生的生命线。于是这些个刊物就成了一个寻租的对象。大家心里都明白，你给他定成什么级了？顶尖还是核心？好了，他就有相应的价码了。从编辑到责编，我也不说具体哪个刊物了，我还是那刊物的编委。我有个学生论文确实写的挺好，我就推荐给他了。这个主编一看说挺好，就答应给发，但是就拖着不给发，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都跟他翻脸了，我说：“你不能发，你早说话，没关系，刊物都有可发可不发的权力。”唉，大家都是朋友，具体的我也不往下说了。

现在高校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里投入严重不足。为什么严重不足？因为我们的聘任制度问题。我聘你到我那来，我看什么？看你哪级刊物有几篇文章。你有五篇文章，好了，特殊人才，我年薪给你 40 万。你到这来是否好好上课，上不上课，上哪几门课，没多大关系。我说这个得从根上扭过来。

怎么能扭过来？很简单。我是学校，聘你来，是因为这两门课没有人上。根据你的经历，我认为你可能上。你给我试讲，我认为行了，你就来上这两门课。两门课上好了，同行认可，学生评价认可，我去续聘你。当然，审定你的资格和续聘你的时候，我会看你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肯定和你有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是有关系。但是我聘你，你来给我干这个活，是要来从事教学工作，这是个基础。上级部门衡量一个学校，学校衡量一个学院，学院衡量一个教师，不再以那些个数量为基础，而在于他在教学中间所承担的东西。这首先是对学生负责，其次对家长负责，再其次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对那些评估的数据负责。

现在研究生的课都要确定课时，确定教室，一次讲三个小时，这符合不符合这个层面教育的内在规律？尤其博士生，书院那种师弟切磋，喝着茶，广泛地讨论，是不是更好一些。或者，多种形式，灵活安排，更好一点？完全把工科思维，

类似工匠、车间管理的方式引到高级人才培养中，可能有些简单化了。

汉武帝时，抗击匈奴有两个名将，一个李广，一个程不识。程不识治军严正，纪律性特别强，规矩特别多，到哪军队安营扎寨，得分多少个区，帐篷怎么扎，得几道绳子，门朝哪头，哨兵派多少个，口令怎么弄，等等，非常严谨。李广就比较松散，我就相信我手下这八个部将，这八个部将各有所长，他们又相信底下的十六个分队长。行了，我提一个最基本要求，你们哥几个自己干起来。匈奴看到程不识的军队不敢犯，因为他非常严格；看见李广“亦不敢犯”，为什么？看着好像很松散，但它内里的战斗力和它那种潜在的创造性是很厉害的。我想培养研究生应该介乎二者之间，有基本的规矩，但是要有自由的空间。

摘自《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

郑永年：中国即将面临一个全民弱智时代

作者：郑永年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超过一万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极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

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

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

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

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作者简介】郑永年，男，1962 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几十年文化买办，掏空了我们精气神

2023-11-14 · 大风凯歌

在中国学界，存在一种现象：无论什么事情或学问，都要外国人说好了才可

以，外国人点头了，自己才敢宣扬。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本质是中国文化主权的沦丧。

中国学术界的很多从业人员从事的是殖民地学术，他们自己也是殖民地学术的代言人。

他们选择了文化买办主义，不生产有意义的文化，也不创造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文化，也不建设有特色的、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本来是为整个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消费和服务的上游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但他们选择了走买办这条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以第二人称的口吻来描绘中国，需要启蒙中国人。搬运工们将进口贩卖的思想带给中国人，自己混个学术饭碗这件事称为启蒙。

社会科学领域缺乏全球性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他们只是学术搬运工，指责中国工商界的山寨现象。他们自己才是最山寨的，最没有资格去指责工商界的山寨现象。

创新首先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涉及深层精神驱动力和文化驱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是错误的。智识结构的创新是摆脱贫困的关键。

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智识阶层为科技工作者打 100 分，社会科学领域的智识阶层则被批评。他们的行为应打负分，因为他们传播的思想、文化和理论都是外国的过时垃圾，污染了中国社会。

福音书政治学和幽灵经济学是最危害中国的洋垃圾。这些买办主义者无视现实，维护自身利益，破坏年轻人的头脑，让人们脱离现实，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才智。

幽灵经济学破坏了社会道德，鼓励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这种神学思想并未成功应用在落后国家，反而瓦解了经济活动的正义。在这种思想中，唯利是图被奉为最高正义，而经世济民被忽视。一些贩运洋垃圾的人和买办主义者利用这种思想，把中国的社会和精神推向混乱。他们指责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却忽视了他们自己的行为。中国人民的智慧并未开启，而是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好东西。

社会科学和买办主义者批评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揭露社会阶层分化和撕裂。他们认为问题源于政治体制，而非幽灵经济学。这些文化买办主义者崇拜神学，将自己变成神棍，炮制鸡汤毒害下游消费者，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健康。

一个国家要输出价值观，首先需要在文化上独立和强大。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文化上的失败。经济强大和文化衰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未来，中国要领导世界，需要以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来领导。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培养真正的文化生产者和创造者。

文化买办利用洋垃圾侵蚀中国人的精神，消灭本土文化认同。他们利用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缺失，试图在经济上殖民中国并失败。然而，在文化领域，他们成功地消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采用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三支航母编队。

外国人和文化买办们教育年轻人数典忘祖，扭曲历史，将中国文化贬低为封建糟粕。这种“文化反思”成为牢不可破的学术正确和文化正确。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总之，要警惕文化买办利用洋垃圾侵蚀中国人的精神，消除本土文化认同，捍卫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在近代史，中国因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导致在古典全球化运动中缺席。如今，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我们有能力利用西方的科技反击他们。然而，西方担心中国的崛起，试图通过文化渗透来削弱我们的民族认同。我们必须警惕这种企图，保持对自身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以便在未来能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文化买办者试图教育年轻人皇军和灯塔王师都是为了给中国人谋幸福。如果鸡窝里出现文化买办主义者，他们会宣扬黄鼠狼是大救星。

荀子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中国人的“道”是民族长久的生存和繁衍。圣人之心应实现天下太平。能带领民族实现安康、文盛武昌、天下太平者，即为中国人的圣人。

那些为蛮夷雇主服务的文化买办，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没有中国、中国人、天下、永久太平的观念。他们贩卖的洋垃圾思想已经破产，没有道可言，只会妖言惑众。

要实现中华民族永久繁衍生息，必须战胜内部独夫民贼和獐头鼠目的文化买办。

中国文化现状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人过于包容一切文化洋垃圾，甚

至忘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现象使得一些人变成了“文化垃圾桶”，盲目接受外来文化，而不再有自己的价值观。有文化的人则不会把自己活成一个垃圾桶，而是明确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并在文化战争中维护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战败的后果表现在国际格局和经济强大与文化衰弱的矛盾，以及国内富裕人群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落后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智识和创造型人才，而不是只依赖知识、思想、文化和理论的单向进口。

华夏即将登上舞台，这是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战略的最大机遇和使命。为了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对之前进口的蛮子文化进行清污，同时为后面的文化重建做准备。要进行文化清污，就要对买办们搬运的文化洋垃圾进行清算，重估一切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完成文化清污后，才能谈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认同和让中国人重返精神家园。

贵为博士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温铁军教授一语惊人：

“哪怕你贵为博士，你贵为教授，你如果没有一种秉持人类良知对社会做批判的能力，不叫知识分子；哪怕你没有学历，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但你坚持了做人的基本良知，你对这个社会的各种不良现象做了批评，你也可以被叫做知识分子。”

北大教授戴锦华说：知识分子跟知识多寡无关，跟一种社会自觉和社会选择有关。什么是知识分子？就是超越你的专家身份，而认为我承担着一份社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当面对暴力、面对强权的时候，选择挺身而出，选择可能舍弃身家性命，来为弱势群体代言，为之发声，为之抗争。你这么做的時候，你就是知识分子；你不做了，回去当专家了，你就不是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身份，不是一个稳固的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的選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是被赋予了家国天下、济世救民的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987 年，美国政治学家拉塞尔雅各比，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最后的知识分

子”的概念，一些犀利，敏锐和不取悦任何人，而甘于不被人知的自觉的社会批评者。

总之，所谓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你拥有学历、职称或学术地位，你就应该是知识分子。

那些认知和主张臭不可闻的人，因为头顶着院长教授博导首席经济学家的光环，便被赋予了知识分子的光环，其实是在糟蹋知识分子的形象。

温教授说，知识分子可以是专家、教授，但专家、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而那些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在舆论场上分享其认知或主张，哪怕认知和主张往往还比较尖锐，极易惹火烧身，但，他们敢于保持异议，说出真理，揭露谎言，他们既不趋炎附势，献媚于权力，也不哗众取宠，取悦于大众，他们既不是权贵的传声筒，也不是弱者的代言人，他们只是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想当年：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不管你是巨富，还是搬砖，坚持做正义之事，说良心之语，不苟且，不蝇营，敢作敢当，敢言敢为，你就是知识分子！你们就是社会的中坚！

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了，相信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知识分子行列！

（悠悠感悟 2023-12-04）（完）

【人民文艺】

丹青风华——开封青年画家丁珂

青年美协 2021-07-16

丁珂

女 1981 年河南开封人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校美术教师

易从书画网签约画家

开封市青年美术家协会花鸟画艺
委会副主任

2005 年 国画花开富贵入册《中
国书画名家大典》。

2017 年《河南经济报》八版刊登
富贵白头 图

2018 年 《魅力开封》国画专刊

2020 年《名人名家》国画专访。

2021 年河南日报客户端，中原经济网作品转载。

河南日报，今日头条，百度百科，艺术中国等官网均有详细介绍。

参加多项国家及省市画展均获得各类奖项证书，部分作品入册或被收藏。

个人成绩及作品在多家媒体报刊上均有展示。



丁珂作品展



